

数字经济时代 区位优势如何界定

□ 杨 振

判断一个区域未来究竟有多大发展潜力，多数人是从区位优势这个基本概念谈起的。在全国各地调研发现，当地政府官员介绍区位优势，无外乎就是距离机场、火车站、码头、交通主干线等有多近，似乎区位优势就等同于交通便利。在有形商品大进大出、工业经济为主的时代，便捷的交通无疑是最大的区位优势。但当我们走进无形商品加速迭代，特别是数字经济引领的时代，有必要对一个地区所具有的区位优势进行重新界定。

为何“区位”会成为影响经济活动的关键变量？早期经济学者关于区位的研究，主要是解释不同产业的区位选择和布局。其中最负盛名的，要数德国农业经济学家杜能，他在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提出，城市周边的农业土地利用方式，会呈现出以自由式农业圈为中心的六层圈层结构，学界称为“杜能圈”。

杜能是个经验主义者，为获得研究数据自己还购置了农场。但他同时又富有想象力，假象了一个“孤立国”来讨论农业生产布局问题。其中心思想是，在孤立国只有一个中心城市的假定下，农产品生产的利润取决于运费是否高昂，距城市中心不同的距离都应各自最适合于耕种的农作物。距离中心最近的第一层是自由式农业圈，主要为蔬菜、牛奶、鲜花等易于腐烂且运费高昂的产品。第二层则是林业圈，用以城市居民做饭和取暖提供木材，因而其运输距离亦不能太远。第三、四、五层主要种谷物，第六层主要经营畜牧业。

这里暗含的判断是区位优势一定是相对于具体产业来说的。显然，在杜能圈体系中，对于那些运费高昂的农业产业来说，离内部中心区域越近的位置，发展这个产业就越有区位优势。因此，不宜脱离具体产业或产业结构，空谈广泛意义上的区位优势。工商业文明时代的区位优势和农业生产主导的时代是截然不同的。农业区位优势，要点在于“向内”与城市中心的距离；而工商业时代的区位优势，则重在“向外”通达全国的便利程度。要问的是，为什么同样是要降低运输成本、同样基于地理位置描述区位优势，代表“优势”的方向如此不同？

对比发现，它们虽共同涉及商品运输，但商品的流动方向存在差异。在杜能

假想的孤立国，只有一个中心城市，农业产品唯一的流向就是城市的中心区域，距离中心区域近也就更有优势。在农业文明时代，农产品的市场交换，在区域内几乎都围绕着区域的城市节点；但是在工商业时代，商品跨区域流动成为主流，市场交换的范围大为扩展，特别是随着依托远洋航运、车站码头的现代物流业快速兴起，能够更便捷地接入外部市场就构成区位优势。

1909年，德国经济学家韦伯出版《工业区论》，考察了大规模的人口跨区域流动与工业区位选择，提出了工业布局的最小费用原则。中心论点是，在人口跨地域大规模移动的条件下，生产者距离产品消费市场综合费用最低的点，就是最佳区位点。最理想的区位，应选择在生产 and 运输成本最小点上。因此，在运输成本成为最重要约束条件的时代，控制了交通要道的地方最具有区位优势，也更容易发展出大规模城市体系。

观察一下历史上较早形成的世界性城市，多数是陆路交通的节点城市和海洋交通的港口城市，它们在“货畅其流”中凸显了其区位优势。“条条大路通罗马”的谚语，证明罗马这样的节点城市交通之便利。地中海岸的城市威尼斯，辉煌时期曾独占地中海海权，13世纪至15世纪是全世界最有实力的海上强国，直到16世纪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开辟了通往亚洲和美洲的新航道，威尼斯才日渐式微。

说到底，在工商业时代，用地理位置向投资者描绘一个地区的区位优势，就是向其传递这样的信息：该地区能够更容易接入大规模市场，更加便利货物运输。特别是，在物流成为整个商品流通“梗阻”的年代，一个地区拥有便捷的交通体系，是引得投资“客似云来”的基础。不过，读者要谨防落入“地理区位优势陷阱”，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距离交通要塞近的城市，就一定能够“自动地”把其区位优势表达出来。地理区位优势的发挥要以能够获取到有效的市场需求分布信息为前置条件的。

改革开放之初，坐落在瓯江北侧山峦之中的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远离杭温公路35公里，相比其他区县，显然不具有纽扣生产和运输的地理区位优势。但凭借近万名跑遍全国的采购和销售人员，能够迅速感知市场需求信息，而后才有机会发展出一个全国有名的纽扣专业市场。温州

模式当年全国闻名，靠的可不是地理区位优势。

到了跨越地理位置和空间限制的数字经济时代，接入大规模市场，不再主要依赖有形的高速公路；感知市场需求分布，技术上也不再主要依靠人海战术。对依赖市场信息特别是数字经济产业的企业家来说，他们看重的不再是距离机场和高速公路的远近，而是接入网络平台、数据中心、信息集散、数据存储等的便利和难易，突出地依赖无形的“信息高速公路”。

可以说，工商业时代的区位优势，是定义在“地理位置”上；数字经济时代的区位优势，则是定义在“信息节点”上的。能否把有形商品运出去，在今天四通八达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主要约束，但能否把市场信息聚合起来并智能化运用，才是关键。因此，工商业时代不具有地理区位优势的地方，数字经济时代反而可能一跃而上，形成独特的数字区位优势。借助低气温、高海拔等自然条件发展成为数据中心的贵州，显然算不上具有传统区位优势，但是随着这些数据中心陆续建立起来，贵州便有了显著的数字区位优势。

2020年，贵州省GDP总量在全国排名仅第20位，但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贵州数字经济增速已连续5年排名全国第一、数字经济吸纳就业增速连续两年排名全国第一，大数据产业发展指数位已高居全国第三。而经济本来就活跃的杭州，则依靠已形成的数字区位优势，在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以及区块链等前沿产业全面布局，在云计算服务领域为全国提供了70%以上的云计算能力；在视频监控设备领域，三家本地企业市场份额就占据了国内市场的58.2%和全球市场的37.4%；而在电子商务领域，杭州更是聚集了超全国1/3的电商平台，支撑了全国85%的网络零售及60%的B2B交易。

这在工业时代是无论如何都难以想象的。在数字经济方兴未艾、地理距离已经不是关键约束的时代，对于那些重点以数字和互联网产业发展为主的区域来说，地方党政干部的思维，也要从传统区位优势转变到数字区位优势上来。能否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信息节点”，将在更大程度决定数字经济时代的区位新优势。

在交通信号灯中，黄灯表示“警示”，含义介于“禁止通行”和“准许通行”之间。当十字路口黄灯亮起，行人必须作出行动选择。现实中，一些行人停下脚步，等待通行；还有一些行人加快步伐，通过路口。行人面对黄灯时作出行动选择，并造成相应后果，就是“黄灯效应”。

“黄灯效应”广泛地存在于经济社会发展等诸多领域。比如，为了应对经济过热，或是推动经济转型，中央政府在某些特定领域发出了“收缩”的警示，恰似十字路口不断闪烁的黄灯。对此，一些地方政府选择踩“刹车”，即在“红灯”亮起前停下车辆，通过展示“令行禁止”来实现“收缩”；还有一些地方政府选择踩“油门”，即试图在“红灯”亮起前完成冲刺，以进一步的“扩张”来谋求收益。

“黄灯效应”是厘清近期大规模拉闸限电现象的一个关键线索。众所周知，着眼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局，我们作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的宣示与承诺，并将一些关键目标列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面对这盏亮起的减碳“黄灯”，一些地方政府猛踩“刹车”，不分青红皂白，对涉及“碳排放”的企业和项目一律“束之高阁”或直接“毙掉”，可谓“逢碳必反”。比如，有些地方为了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指标，停止一切煤电项目上马，停止一切焦炭和原料煤外运；有些地方为了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和能耗强度，对钢铁、铁合金、水泥等传统产业采取限电或限制生产线等应急管控措施，甚至连新兴产业也不放过，统统按下暂停键；有些地方对猪、牛、羊、禽等的养殖也以生态治理、环境保护的名义“一锅端”；有些地方脱离实际和中央要求，相互攀比“碳达峰”提前实现的时间，且层层加码；有些地方违背规律和全国统筹，提出本区域内的碳中和方案，并大大停；等等。这些“运动式”减碳行为，弱化了电力部门的错峰调节能力，造成了电力供应的突然吃紧，影响了下游产业的健康发展，损害了民营企业投资信心，恶化了亟待改善的营商环境，扰乱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破坏了中央政府的减碳战略，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造成了负面影响。

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猛踩“油门”，将“碳达峰”的时间节点视为重要的窗口期，把“碳达峰”当成“碳冲锋”，想方设法造成

“碳达峰”前“两高”项目建设和运行的既定事实。比如，有的地方大搞“两高”（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的未批先建，即在未做环评、能评等手续的情况下大上、快上、抢上、乱上“两高”项目；有的地方大搞“两高”项目的“绿化”，即用新能源项目给“两高”项目打幌子，在上马一个“两高”项目时搭配一个能级与之并不匹配的光电或风电项目；等等。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2021年上半年各地区能耗双控目标完成情况晴雨表》，青海、宁夏、广西、广东、福建、新疆、云南、陕西、江苏等9个省（区）能耗强度同比不降反升，浙江、河南、甘肃、四川、安徽、贵州、山西、黑龙江、辽宁、江西等10个省能耗强度降低率未能达到进度要求。这些“突击式”增碳行为，或为抓住机会，给现在的发展增添动能，或为做大峰值，给以后的发展留出空间。在触碰了“能耗双控制度”的警报后，一些地方政府采取了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即不分民生、工业和商业用电，全部拉闸限电。这在影响了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同时，也暴露了地方治理的功利与无能。

综上所述，透过“能耗双控制度”“煤炭供应突然吃紧”等表面现象，可以厘清拉闸限电现象的形成逻辑。简言之，地方政府面对“碳达峰、碳中和”的警示，在“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过程中或踩“刹车”，搞“运动式”减碳，或踩“油门”，搞“突击式”增碳。相应地，这或造成电力供应吃紧，导致一些地方“无电可用”，或过度透支能耗额度并触发警报，导致另一些地方“有电不敢用”。“运动式”减碳与“突击式”增碳叠加共振的结果，便是大规模拉闸限电。进一步看，在“碳达峰、碳中和”的“黄灯效应”中，地方政府展现出了典型的机会主义行为，背离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不是有为逻辑而是无为逻辑，不是高质量发展逻辑而是高速度发展逻辑。

黄灯，是人类交通文明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应对路口“黄灯效应”的方法论不是取消黄灯，而是矫正人们的行为——既不猛踩“刹车”，也不猛踩“油门”，而是“一慢、二看、三通过”。同样，应对减碳“黄灯效应”的方法论也不是取消警示，而是矫正地方政府的行为——既不搞“运动式”减碳，也不搞“突击式”增碳，而是遵循规律、循序渐进地减碳、降污。做到这

减碳谨防『黄灯效应』

□ 李 猛 胡墨如

一点，关键是让地方政府完整、准确、全面理解新发展理念，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有为逻辑和高质量发展逻辑，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此，一方面，加强外部的引导。加快构建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考核体系，抓紧制定国家减碳总体行动方案和各主要方面的专门行动方案，部署研究绿色低碳前沿技术，推动特色产业领域绿色低碳技术率先突破，加快推广应用减碳技术，夯实“碳达峰、碳中和”的基础，等等。另一方面，加强内部的监督。鼓励企业依据即将出台的国家总体行动方案和专门行动方案申诉地方政府过急、过严、泛化的减碳行为，鼓励群众举报未批先建的“两高”项目，鼓励社会组织依照环境保护法起诉未批先建的“两高”项目，等等。

经济时评

产业金融如何服务产业优化升级

□ 俞华军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壮大实体经济，都离不开制造业，需要在推动产业优化升级上继续下功夫。开启“十四五”新征程，产业金融作为产业与金融结合最紧密的重要经济领域，如何适应产业优化升级的需要，成为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适配性的重要内容。

在产业金融领域内，产业是基础和根本，金融起到催化剂、润滑剂和倍增剂的作用，在良性循环模式下，两者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相互促进，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实现“1+1>2”的效应，带动产业规模快速发展壮大，为经济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产业金融是产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是向更高层次迈进的必由路径。从不同角度看，产业金融具有不同的内涵：从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角度看，在产业发展政策的背景下，凭借一系列金融业务活动来推动特定产业的发展，全面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可以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从风险防范角度看，产业金融不仅是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耦合，更有两者协调有序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产业是金融发展的基石，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牢牢把握这一根本原则，避免金融脱实向虚，

是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治本之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倒逼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产业金融发展迎来巨大契机，也面临重大挑战。只有金融体系结构与产业经济结构高度匹配、深度融合、良性互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金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的有力支撑作用。当前，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上升势头得到有效遏制，高风险银行的总资产目前仅占银行业总资产1.4%，金融脱实向虚、盲目扩张得到根本扭转。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隐患仍未消除，部分行业处于周期底部，个别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加大，国际金融市场不确定性增加。对此，产业金融需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坚持新发展理念，明确高质量发展目标，把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补齐短板、强化弱项，树牢规则、划清底线，推动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打造产业金融升级版，增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能力和促进作用。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优化监管框架顶层设计，强化跨部门、跨地区、跨领域水平协同联动，对于提升监管能力和水平具有深远的意义。当前，产业金融呈现科技化、资本化、垂直化、生态化发展趋势，在应对变革、促进创新、提升效率和实现共赢的同时，相应风险的累积程

度和传播速度逐渐放大，风险传播机理更加复杂，对金融监管及时性、有效性、全面性和专业性提出了新的要求。优化监管框架顶层设计，需要着眼于产业领域的专业性、科技进步的复杂性、风险管理的差异性、跨界风险与合规的统一性四个方面展开。科学把握产业金融形态和本质规律，推动金融监管与时俱进，既要避免因治理手段简单生硬而扼杀产业金融发展需求，也要转变治理观念和方式方法，探索建立风险预警和跨部门协同处置机制，及时准确识别研判处置风险，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全链条风险可控能控在控，不断提升监管效能。

产业金融发展历经三个阶段，从直接面向单点客户的传统金融服务模式，演进为沿产业上下游布局的产业链金融模式，近年来逐步形成以产业为核心、以平台为拓展方式的产融生态圈模式。资本化是产业金融的重要趋势，资本的不断集聚催生了金融控股公司、金融平台和金融中心等市场主体。此类金融控股公司的发展，具备其必然性、创新性，而其监管，尤其是对资本和风险的穿透监管，应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产业金融发展风潮遍及各类行业，一些实力较强、经营规范的机构通过金融控股平台模式，优化了资源配置，降低了资金成本，丰富和完善了金融服务，有利于满足消费者和产业链的需求，提升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但在实践

中，也有少部分企业盲目向金融业扩张，内部治理失效，市场行为失范甚至违法违规，债务杠杆高企，隔离机制缺失，资金脱离实体经济空转，造成金融行业秩序混乱和社会经济的不稳定。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对金融控股平台监管的规章制度，填补规则空白和漏洞，不折不扣落实准入管理和持续监管，提升制度执行效能，有利于防范风险交叉传染，促进经济金融良性循环。

一个良性循环的社会经济形态，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产业金融生态，产业金融通过更好地赋能实体经济，才能真正体现其存在价值。因此，优化产业金融发展生态，需要企业和监管共同努力，把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和促进人民生活改善作为第一要务。面对市场环境和监管要求的不断发展变化，产业金融相关企业要立足主业，找准自身定位，聚焦目标客户群，创新商业模式来构建自身独特的产业金融服务优势。要更加注重发挥金融对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更加重视资金来源和运用的稳定性、合规性、有效性、安全性，不断加强股权结构、公司治理、关联交易、风险管理体系等方面的建设和管控。着眼于长远，面对新经济形态、数字化浪潮和客户需求的多样性、变迁性，产业金融企业需要不断思考自身在新产业生态中的定位和经营管理模式，制定更加彻底的转型升级战略，抓住新机遇，迎接新挑战，更好地赋能产业提质增效和民生改善。

名词式创新抑或产业新形态

今年以来，诸多互联网头部企业相继布局“元宇宙”，各路资本也纷纷对标跑马圈地。一时间，“元宇宙”似乎成为下一个科技投资的风口。“元宇宙”究竟是互联网行业惯常的名词式创新，还是代表着互联网产业发展的真趋势和新形态，有待进一步的实践检验。

从互联网产业对于“元宇宙”概念的初步共识来看，“元宇宙”是整合了多种新技术而产生的在线虚拟世界，包含身份、朋友、沉浸感、低延迟、多样性、随地性、经济和文明等要素；是基于扩展现实技术提供沉浸式体验、基于数字孪生技术生成现实世界的镜像、基于区块链技术搭建经济体系等，试图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密切融合的应用形态。

若想“元宇宙”不是简单的“新瓶装旧酒”的名词式创新，需要将其想象的虚拟世界转变为现实的应用场景，有赖于技术性突破和更多适宜应用场景作支撑。但当前“元宇宙”高度依赖的虚拟现实技术（VR）、增强现实技术（AR）、制造物品在虚拟世界中的镜像的数字孪生技术等与想象的“元宇宙”生态技术都相距甚远。

“技术渴望新产品、资本寻找新出口、用户期待新体验”——这是“元宇宙”概念红火的主要原因。但“元宇宙”从概念到落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比于陷入对“元宇宙”的无尽想象，更为可取的一种态度是脚踏实地地想明白“元宇宙”依赖哪些新技术，又能催生哪些新技术，能够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机会和便利。因为只有让更多应用场景和新技术的加持才会让“元宇宙”概念落地更可靠，才能够真正的构建起“元宇宙”的产业形态。

（毛 强）

经济名词